

松花江上

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告别丰岛园

孟庆华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告别丰岛园

孟庆华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告别丰岛园/孟庆华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1

(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0440-3

I. ①告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1321 号

责任编辑:程黛眉

装帧设计:瞿中华

出版发行: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100708

网 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010-57350521

门市电话:010-57350370

印 刷: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20.5

插 页:2

字 数:294 千字

版 次: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1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41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010-57350337

目 录

- 一 回归日本 /1
- 二 “甜蜜”的集中营 /3
- 三 定居东京 /6
- 四 寻找工作的日子 /13
- 五 万事开头难 /17
- 六 返乡探母 /29
- 七 我成了一名清扫工 /42
- 八 在日本人家打工 /62
- 九 一段悠闲美好的时光 /75
- 十 四月,迎来海洋夫妇 /84
- 十一 给中国同胞打工 /104
- 十二 铤而走险思那库 /125
- 十三 海洋婚变 /156
- 十四 先生又莫名其妙地成了日本鬼子 /178
- 十五 日本朋友大泽 /185
- 十六 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 /208
- 十七 海洋的饺子店 /221
- 十八 千姿百态的华人同胞 /237
- 十九 我身兼两职:教授和清扫工 /253
- 二十 我也遇到了便衣警察 /275
- 二十一 同是天涯沦落人 /291
- 二十二 突如其来的东北关东大地震 /312
- 后记 /317

十五年来，我的先生老祖，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这一辈子呀，最大的心痛就是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起源在哪儿，也不知道自己死后该葬在何处……你说，我有两个祖国，可两个祖国都待我像外人，在日本吧，一张口就是中国味儿的日语，日本人从心里就把我当成了中国人。回到中国呢，我又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日本鬼子，就好像是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一样……”我想，这些话就是他心里永远也抹不去的遗憾吧。

一 回归日本

又到了二月五日。

从十五年前开始，这个日子就成了我们家族的节日。二月五日，对于我们家族来说，它和其他的重大节日一样。不同的是，它更具特殊意义，更令我们刻骨铭心。

十五年前的这一天，中国北方的哈尔滨正值寒冬腊月，冰天雪地，也正是中国人的大年年根儿底下。大街上，熙熙攘攘的人流欢声笑语，人们顶着漫天的飞雪，采购着过春节的年货。

而此时，我们祖家已无心准备过年。我们一家六口人就要分离的时刻，随着年关的到来而悄然临近。我们要把长子海洋和年近多病的姥姥留在中国。我和先生带着次子海岩、女儿海燕去日本定居，去重演半个世纪以前，我的先生被他的亲生父母扔在中国的历史悲剧。戏剧性的是：地理位置发生了倒转。

一月三十一日晚，我们乘坐十八次特快列车去北京，住进了日本大使馆早已为我们这批归国孤儿预订下的紫龙宾馆。在这儿，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四天。二月五日的凌晨还不到四点，几十名有着同样命运的归国孤儿及他们的家属，就都争先恐后地醒来了。大家静悄悄地提拉着

头一晚准备好的行装，摸着黑，你跟着我，我拉着你，紧张有序地登上了早已停在紫龙宾馆门外的豪华大客车。客车带着我们这些怀揣梦想、渴望亲情、祈求命运发生逆转的几十号人，在北京黎明前的黑暗中向机场驶去。朦胧的北京城，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的身后。

这一刻，我不由心绪复杂地别过头去，望着黑幽幽的窗外，我意识到这一去，不知何时还能再回来。那一年，我毕竟是年近半百了。生命中的亲人、朋友，都留在了这里。那一刻，我竟突然动摇了，胆怯了，不知道在日本即将开始的新生活，究竟是福还是祸，这种选择，到底是要去天堂还是下地狱呢？我和先生作出的这个决定，是不是太轻率了……

是呀，那一年我年近五十，先生他也五十出头了。我们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。我们不再年轻。我们带着一双儿女，要去的日本，虽说那里是他们父亲的祖国，却没有寻找到先生的任何亲人。虽说先生已经成了日本人，他却不会说日本话。对于将要去的日本，我们是太陌生了。为了能去日本，先生和我，不得不辞退公职。为此，我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先生执意要回日本，我理解。他三个月大时，就被亲生父母送给了他的养父母。养父母家只有他这一个孩子，待他如同亲生儿子。在他成长的漫长的岁月里，养父母都竭力忘却和隐瞒这件事。当先生渐渐长大，成人、成家之后，隐隐地从邻居那里听到一些传言，但也从没有勇气面对养父母去询问这件事。他心头的这个结，一直默默地打了五十年，直到先生的养母临终前对他说出真情后，一再嘱咐：“快找你亲妈去吧。”“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”我看见先生眼含热泪拼命地摇头，并抓住养母枯干的手，不停地揉搓着说不出一句话来……

养母说出真相后不到一周，就离开了我们。安置好养母后，先生就向我道出了他想寻找生身父母的决定。我没有惊讶，而是顺从了他的决定。他毕竟是日本人，他迟早要回日本的。世事真是变化无常啊，就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，政策一来，又全部返城一样，更何况是寻根啦。我想，这不是他一时的决定。这个想法在他心里，肯定是已有相当久的年月了。为了养母，他才始终没有说出来罢了。

如今，婆婆安心地走了。她去了天国。

如今，我们也要走了。我们要去日本。

二月五日，飞机从北京机场起飞，再从上海转机，下午三点左右，我们就到达了日本。

东京，这座国际名城，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干净，简直是太干净了。街上没有尘土，更没有垃圾。虽是寒冬腊月，大街上的树绿着，花开着，人们穿着漂亮的春装匆匆而过。这场景，和二月的我的家乡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哈尔滨现在正可谓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呀。

来迎接我们的人用中国话告诉我们，东京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，我们要乘客车去不远处的所泽，要在那里度过四个月的培训生活。

如梦如烟的命运，从此就这样在日本拉开了序幕。

二 “甜蜜”的集中营

我们这一批学员，在所泽度过了四个月的“甜蜜”集中营生活。

所泽市位于埼玉县内。埼玉县紧邻东京的北面。从所泽乘电车，仅仅需要二十分钟，就能到达东京境内。从地貌上看，首都东京和它相邻的各县市已没有明显的区别，城乡差距很小，已浑为一体。

来到日本后，我们第一站的立足之地。就是埼玉县的所泽市。因此，我们许多人对日本国的第一印象，也大多来自这个城市。

我们被安排在所泽市的“中国归国者促进中心”。这是一座铁灰色的二层楼房，楼房四周是低矮的铁栅栏。栅栏内有宽敞的庭院，庭院内种着盛开的鲜花。后院内的草坪上，有一条镶着间隔的石板路，石板路的上空，架着一排排的长栏杆，这些栏杆是用来让我们晒衣服的。这里永远是彩旗飘飘，热闹非凡。

楼房是 U 型建筑，在 U 型的堵头处，一字排开地摆放着十几台全自动洗衣机，免费供我们使用。

在我们到来之前，据说这里曾经接待过五十几批学员了。

因此，这里的管理并没有因为我们一百多人的到来而显得手忙脚乱。一切都井然有序，令人震惊。日本人真的是太精细了，他们精细得大到每

个房间的空调、冰箱、电视、被褥，小到每个人日用的杯子、牙刷、筷子及毛巾拖鞋，都已为我们备好，成一线地摆放在房间里。

我们一家四口，分到两个房间。我和先生住一间，对门是我们的一双儿女的住房，格局和我们的一模一样，都是上下两层的木床。桌子上有电视，墙上有空调，地上铺的是榻榻米。略显昏暗的粘着毛纸的木格吊灯，让人不由心生一种过去在电影中才可见到的日本情调。

初来乍到，新鲜和好奇感令海岩和海燕俩兄妹如同出了笼的鸟儿，终日快活地骑着学校发给的自行车，穿梭在所泽市的大街小巷。

我和先生担心，要是撞了人可怎么办？我们又不会讲日语，怎么赔得起呀？

海岩忙说：“不会，我们骑车技术高着呢。”

“瞎吹，”海燕嘴快地抢白她二哥，“你昨天还刚刚把一个姑娘给撞了呢。”

听罢，我立马吓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

海岩红了脸，瞪着他妹：“瞎说什么？就你嘴快！”又看看他爸，嘟囔着：“就会打小报告，不过，人家可没怪我，还反过来给我赔礼道歉呢。”

先生火了：“快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爸，你别急，二哥说的是实话。你说怪不怪，这日本人可真有礼貌，二哥撞了她，她还反而给二哥赔不是。我说嘛，这日本咋看不见打仗的呢。就不像咱们，个个火气大得很。他们互相碰撞了，还要互相对着头儿鞠躬道歉，你说好不好玩儿？那样儿，就像两只对着头啄米的鸡……”

十几年过去了，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强烈的印象，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已渐渐地退去了它本来浓烈的色彩，变成了一幅幅清淡的水彩画，孤零零地挂在我心中的一个角落。多少次，我闲来无事，想记录下这段生活，却什么也写不出来，就让这幅画孤静地挂在那里。我心想，等到了一定的时候，需要表达和倾泻再说吧。这一放，就放了十几年。

现在细细地回味起所泽，有一种说不出的“甜蜜”集中营的味道。在这里接受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适应未来的新生活，也就是要丢掉一切从

中国带来的不被日本认同的、伴随了孤儿大半生的习惯，学习日本的大小规矩，小到厕所的刷洗方法，大到将来如何适应日本的生存环境，向新生活靠拢，学会自立的手段等等。

说话，接人待物，如何存钱取钱，如何利用邮局、图书馆，到餐厅怎样点菜、怎样使用刀叉，如何去车站，怎样看路线图、买车票，等等，等等。我们就像又回到了童年一样，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，重新开始。真是既新鲜陌生，又让人感到刺激和好奇。至于将来，就像一个未知数，暂时也只好不去想它了。

那时，学校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辆自行车，我们每天骑着它去学校学习日语。从住处到教学楼，要经过一个辽阔的美军基地，还要路过许多楼群，对刚刚从中国归来的我们来说，当时最具诱惑力的就是住宅区那些垃圾。日本的垃圾，可万万不能与中国的垃圾等同。它包含了所有的生活用品，有许多甚至是全新的，都带着价格的标签就被扔掉了。这大概是日本人的住房都很狭小的缘故，家里基本不存放多余的东西。日本人在扔东西上的慷慨程度，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。这一点，十几年后也成了我们的习惯。日本人为这种行为取了个时髦的名字叫“断，舍，离”。

初到日本的中国残留孤儿，大多来自中国的农村，曾经的贫穷，和来了之后、过去在中国所拥有熟悉的一切在一夜之间都消失的现状，令人担忧。今后是融入一个和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。一想到这些，一种莫名的恐慌感就油然而生。每每路过犹如免费超市一样的垃圾堆时，难免不驻足观望。当时，大家都没有工作，除了学习，业余生活就是捡垃圾和买便宜的生活必需品。相比之下，捡垃圾是最具诱惑的。从生活用品到家具，我们甚至把钢琴都搬了回来。渐渐地，我们的住处，垃圾已堆成了小山。于是，培训中心的老师发怒了，三令五申地斥责这种行为，气急败坏地堵截捡垃圾的人群，声称学校不负责运送捡来的垃圾。学校长廊的大喇叭里，经常不断地用汉语呼吁我们不要去捡垃圾，苦口婆心地劝大家，讲垃圾对人的健康的种种危害。当劝解不起任何作用时，学校也就更加严厉起来。

“你们现在也是日本公民了，怎么一点儿尊严也没有？”训话的老师，也是早几年从中国回来的残留妇人。由于她会讲日语，又懂汉语，就当起

了老师兼翻译。可是，尊严对穷人来说，当时真是一钱不值。它只能说给那些吃饱喝足的人听听罢了。

我们这一群人，对于未来，心里没有一点儿底儿。从前在中国过惯了节俭的日子，现在每每去超市买东西时，总要习惯地折算一下，一根大葱就要七元钱哪，一瓶可乐也要花七八元钱。就连商店里一件处理的衬衫，折合成人民币也要卖到百八十元。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，百八十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它相当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啊。再说，花七元钱买一根大葱，总觉得太亏了。在中国，这些钱能买一大堆呢。

生活必需品是非买不可的。其余的东西，则将就就将就，能捡到的就决不花钱去买。这就是我们初来日本时的心态。

由于校方三令五申不许捡垃圾，大家也就不敢结队而行。大多数以地域、家庭为单位，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日伏夜行。在垃圾场、路上相遇，也就心照不宣地笑笑，笨拙地说些连孩子都能识破的谎话。

三 定居东京

六月二日，是我们这批归国者出所的日子。四个月飞一般地过去了。我们这群人如同被所泽这所学校放飞的鸟儿一样，从此要飞向日本的四面八方，奔赴各自的新家了。

来到东京，我们的第一个落地地就是丰岛园。租的第一处住房，就像我们小时候用积木搭成的那种小屋。这种木头房子共分为两层，我们夫妻和孩子都住在楼上。楼下住两家，孩子楼下住着一位伊朗人，我们楼下是一对老夫少妻的中国人。

这种木质材的住房被日本人称作一户建。一户建住宅，建材全部使用木料，其优点是通风透气，而且重量较轻。在日本这个多发地震的国家，这种建筑很受欢迎，往往是有钱人的首选。

对于没钱的我们来说，优点反而变成了缺点，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空调，只能任天摆布。在北方生长的我们，在烈日下的木板房里，初次尝到了汗如雨下的滋味。冬天我们在阴冷的被窝里，看着窗外落光了叶子的柿树枝，一只乌鸦在光秃秃的枝条上，叫得令人心头发颤。

生活安顿下来后，我们一家四口都如愿地进入了拓殖大学学习。两个孩子进了白日班，开始努力地学习日语，为能尽快地融入日本社会，为今后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日本公民，开始了他们的人生新路程。

我和先生被分在拓殖大学的夜班学习，每晚六点开始，九点结束。白天的时间属于自己，过度的宽松、自由让我们一时难以适应，那一段日子，我们成了东京真正的无业游民。

无业游民的日子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，现实，就如同掉进了生活的泥沼一样艰难。

但是，我们又必须正视现实。在所泽的学习时间只有四个月，我们那时候的日语水平，充其量也只能说些日常生活中的问候语。来到东京后，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，我和先生还可以再学八个月的日语。在这八个月里，可以接受生活保护费，因为当时还没有给付金这一说。接受生活保护费本是难民的待遇，但是残留孤儿并不是难民。这就是说，日本政府从本质上混淆了孤儿和难民的区别。据说，这个错误的制度从一九八八年开始，并一直延续至今，现已有两千五百多名孤儿回到了日本，并且有百分之七十的孤儿接受了生活保护费。

生活保护费是由日本政府和地方政府来支付的公费。可以报销一定数量的房费，像我们找的这种房自然超过了最低的限制，超出部分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孤儿及家属在这期间如果有病，国家会替我们买单。在东京都内，坐公交车也可以免费，就像中国如今流行的七十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一样。政府给的生活费，虽说让我们不能天天吃上寿司，喝上啤酒，但也决不会饿死我们。不公的是，孤儿不是难民，造成我们不幸的是日本，是战争。

在孤儿接受生活保护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做人的自由和尊严。身元引受人（来日本的保人）和生活指导员（翻译）在指导孤儿的生活时，也会不断地给孤儿施加压力，催促我们早日自立。

我们不敢吃好的，不敢穿漂亮的，一来没钱，二来怕被人说“生活保护费是国民交纳的税金，是国民的血汗钱”。

在东京，我们摆脱了在所泽时被人监督的“甜蜜”集中营的生活，过起了无忧无虑的日子。这无忧无虑中又夹带着些提心吊胆，和偷偷摸摸的

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

六月过后，东京的天“呼”的一下就热了起来。

我们在这间木板房里过了一夏天“桑拿浴”的日子。那时候，我和先生晚上从学校归来，尽可能慢慢地走，真恨不能就住在外边。外边有风，比家里舒服啊。那时候我们才感觉到，什么叫有家不能回。

全家人的情绪也随之低落下来。天天盼着阴天，盼着下雨。东京的夏天，不像故乡哈尔滨那样凉爽惬意。

东京的夏天，要从七月初开始，直到九月底才能告一段落的。没有空调的日子里，我和先生就这么一天天地熬，一天天地数着，艰难地度过了东京的第一个夏天。

先生患有高血压，患有高血压的病人似乎比常人更怕热。那时候，他每天起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玻璃窗向外张望，只要看见太阳火辣辣地升起来，就会黑下脸来，急匆匆地装上一瓶水，去图书馆避难。我曾好信儿地拿来血压计，天哪，高压都超过了一百八啦。有时，我担心他，不让他出去，他就会大发脾气，越是着急，血压就会越高，无可奈何的我，只好任他去了。

海岩和海燕心疼爸爸，劝我赶快买台空调安上。我和先生商量，他想想说：“怕的是买得起马，置不起鞍哪。”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即使买了空调，一个月得需要多少电费啊，我们那时心里是真没有数呀。

再说，日本人都不会在夏天买空调的，这是应季商品，买也得等到冬天。

那时候，除了空调以外，我们家最需要的就是自行车。为了买便宜菜，就得骑自行车去偏远的商店。买台新自行车差不多得一万三千多日元。捡台旧的吧，东京的垃圾可不像所泽那样到处可寻。这里的垃圾是分期分点的，过了收垃圾的钟点，大街上干干净净，光光溜溜，一毛不剩的全被收走了。这就是大小城市的区别。在所泽时捡垃圾，是人多势众，可以不在乎。在东京，别说捡，走过垃圾堆时斜眼看看，都会感到脸上热辣辣的，我想，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做贼心虚吧。

搬进新家近两个月了。我们只是搬来时，依照日本人的习惯，给一楼的两家邻居送过毛巾之类的礼品，平日见面问个好而已，还没有和邻居有

过实质性的接触。

在日本,大家都很忙,忙着挣钱。不过,一楼的那个老王,他老婆倒像个例外。老王家门口是我们来回的必经之路。每当经过时,年轻的女人总要拉开门,探出头来笑笑:“姨,你回来啦?”她高挑身材,五官端正,一说一笑,带俩酒窝,属于很会讨人喜爱的那一种。

我们用中国话一搭腔,她马上兴奋地自报家门,原来她也是哈尔滨人,今年三十五岁,名叫艳芬。

艳芬半敞着门,斜探出大半个身子,浑圆结实的胳膊支在木楼梯的墙壁上,她的胳膊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的先生趁她支胳膊前抢先一步,踏上了楼梯,回头笑笑:“慢慢唠啊。”

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。人不亲土还亲呢。我索性后背靠墙,和艳芬开始了第一次长时间的交谈。

“姨,你们是归国孤儿吧?”

见我吃惊,艳芬忙解释:“其实,我们家老王,就是跟一个残留妇人的后代来的……所以,我听说过残留孤儿的事儿。”

“那你跟老王?”我欲言又止。

艳芬倒不在乎,爽快地笑着,自打圆场:“他们早就离了,我是后来跟他的。”

“你们老王真够福气的。”我这么违心地夸奖的时候,不由地想起了老王那个秃头顶,油汪汪的脸上,长着一双鼠眼。走起路来还一摇一晃的,像个十足的地赖。

先生听了这件事之后,嘱咐我:“别惹事,少掺言啊。这种人往往爱起疑心,邻居住在一起,还是敬而远之为好。”

想必是艳芬过于寂寞的原因,有了第一次接触之后,只要她不打工待在家里,只要我们从她家门口路过,哪怕是踮起脚尖悄悄地走,她都会冷不防“吱”地一声,把门拉开,笑盈盈地冲出来和我搭讪。

艳芬说,老王比她大十多岁,在她之前,老王已经结过五次婚了。也就是说,老王已经把五个女人先后办来日本了。五个女人,来日本混个合法身份以后,又都先后嫌弃他,离开了。

“我是他办来的第六个啦!”

我只能默默地点头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反正我也是离婚的……还有个女儿在哈尔滨呢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一了。跟我妈一块儿过。”

艳芬往往讲得眉飞色舞，仿佛不是在说自己，而是在讲他人的故事一样轻松。

艳芬很矛盾。她不满意老王，又不得不委屈地跟着老王。她要老王帮助她，取得永住权，这才是她嫁给老王的唯一目的。老王也不是个傻帽儿，他经历了五个女人先后抛下他另攀高枝而去，哪里还会轻易地再上这种当。他就给艳芬来个半年一签，半年之后，又给改为一年一签的居住签证。其实，像老王这样有永住身份的人，婚后可以直接为配偶办理一年签证的。连办两年后，就可以办理三年的签证。只要能如愿得到三年的签证，当年就可以向入国管理局出示各种证件，并附带给法务大臣写一封信，永久居住权就到手了。

就这么简单的问题，让老王给复杂化了。因为老王深知，永久居住权到手之日，也就是他和艳芬分手之时。他不怕麻烦，宁愿半年跑一次入管局，也不肯轻易地把便利让给他的心爱。

艳芬很快就识破老王的诡计。

于是，楼下的战争开始不断，并且逐步升级。

夫妻之间的战争，别人越是劝，就越会变本加厉的。如果不睬不理，也就自生自灭了。

只是老王和艳芬之间的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。老王洗完澡发现钱包里的钱被艳芬偷走了，就气急败坏地怒吼：“你个臭婆娘，敢情你还是个贼呀。”

艳芬泼辣地与他大骂：“那怎么叫偷呢？那是你该付的，我来例假了，你还要干，不要脸，还说什么谁管你白的红的，反正我得把我那点东西蹭出来。你说，你是人吗？”

“啪！”一声脆响之后，便是两个人抓挠在一起的厮打声。

我们这栋简陋、陈旧的木头房子不隔音，被他们这么一折腾，就像发生了三级地震一样，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声响。

我们搬离那里两年后的一天，我接到过艳芬的一个电话，她告诉我，她和老王分手了。老王的上司为艳芬租了间房子，她已经把女儿成功地办到了东京。

“拿到永住了吗？”我担心地问。

“没有。这个王八蛋。我想，我再跟他靠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姨，你说我都快四十了，我跟他靠得起吗？”

“今后你怎么打算啊？”

“走一步算一步吧，反正，现在的房费也不用我交。打工挣的钱足够我们娘俩花的了。”

听艳芬的口气，她挺知足的。她没道破，我也没好意思问她跟老王上司之间的关系。据说那位上司是有老婆的台湾人。“要当心啊！”这话到了嘴边，我又转了弯儿：“你们对门的伊朗人还住那儿吗？”

“他好像上个月回伊朗了。”

长着浓眉大眼的伊朗人不大爱说话，整日里筋疲力尽的样子，好像在东京干着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
“住那破房子的哪有富人哪。姨，你说我傻不傻，当年来日本看老王住那破地方，就不该跟他这么多年是不是？真后悔……”

快乐幸福的生活大概过了不足一年，艳芬又打来了电话，这次垂头丧气地说：“姨呀，我要回国了。”

我下意识地“啊”了一下，正不知该如何安慰她，艳芬又换了一种口气：“反正我钱也挣得差不多了，回国后我去烟台，在那儿买套房子，再开个小买卖。”

我默默地听她讲着她回国后的宏伟计划，想起老王说过的话，艳芬过去就是个干小买卖的。他们打仗时，老王骂过“操你妈的，老子下辈子就是打光棍儿，也不再找你这干小买卖的，真他妈的难缠”！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艳芳的任何消息，至今也不知道她人在何处，过得是否幸福。想起艳芬时，就后悔当初没有留下她父母的联系电话。

数月后，我和先生成了东京名副其实的无业游民，整日闲散地在四周转悠。用先生的话说，这叫熟悉地形。我和先生不一样，天生是个方向盲，对地形不感兴趣。先生呢，凡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首先要了解那儿的地形、地貌，交通方不方便啦，周围有什么名建筑啦，特别是对住房的朝向非常看重。别说，经先生指点，我还真在住房的朝向上悟出点儿道理来，住朝南和朝北的房子，真是犹如天堂和地狱。

东京都内，人口稠密，住宅狭小，寸土为金，能住上朝南的有着明亮玻璃窗的大房子，也成为一种奢望。

无望中，我们常常会想起留在中国的那套大房子：从早到晚，洒满阳光的房间里，三只可爱的狗儿，翘着尾巴，在光亮的地板上跑来跳去，欢快地从这一间又滚到了那一间……那时候是多么的幸福哟。美妙的时光一去不返。快乐就让我们这么轻易地葬送了。

那时候，国际电话费还很贵。不像现在几乎成了免费的了。时代的进步，通信事业的高速发展，也大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那时候，我们只能每月打一次电话，还不敢多说。电话交谈中我知道妈妈还好，海洋在上班。据说海洋的同事为他介绍了一个对象，姑娘的工作也不错。

当时，我们在东京的生活虽然如此困难，可在国人的眼里，就像是一步登了天。好像一旦和我们搭上关系，就能够轻易地来到日本过上幸福生活一样。渴望出国的人，这似乎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。海洋自然成了姑娘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听我妈说，我们走后，来我家给海洋介绍对象的人陆续不断，前来打探情况的也大有人在。那一年，海洋二十四岁多了，虽说找对象早点，可我们都不在国内，如果能碰上个好姑娘，那也是我们巴不得的事情，海洋也好有个人照顾。

我们开始着手办理海洋来日本定居的手续时，还不太会说日本话，办理这个手续相当复杂，需要身元引受人出面，还要等待先生加入日本籍以后，才能把海洋办来。我们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朝着这个计划靠近。

起初，我们在日本的家就像日本大多数家庭一样，没有床，每天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地生活。这种生活让我感到不方便又不习惯，有时，甚至就觉得自己像一只狗一样，活得很窝囊。

我曾发狠跟先生说：“咱们宁愿吃不上新鲜的菜，宁愿不吃生鱼片，不喝啤酒，不拎名牌包，不穿名牌衣裳，也得买台空调，买张床。”

等到秋天空调掉价时，我和先生才去秋叶原买回了一台。我们又从池袋订购了一张双人的紫檀色木床。这两样东西，是我们来日本后添置的头两件贵重的东西。想想狗爬的滋味，想想一家人在火一样的夏天有家不能回的滋味，我不心疼更不后悔。

没有语言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钱。只有我和先生，常常是大眼瞪小眼地干坐着。我们那一阵儿很少说话，也不再没完没了地探讨我们来日本到底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。我们有点儿厌倦了。

孩子们太忙，无暇顾及我们。他们白天上课，放了学饭都顾不上吃，就跑到二十四小时店去打工，半夜才能回到家。打个招呼，洗洗澡，匆匆睡下。第二天醒来，又匆忙扒拉一口饭，拿起书包往车站跑。他们年轻，语言关过得快，工作也好找。

日子就这样慢慢地流淌着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又寻到了新的爱好，喜欢上了相扑比赛。这是一种简单的运动，不需要语言，只要记住他们每个人的面孔就行。这种简单的快乐陪伴我度过了最初的寂寞，并迅速成了我强烈的兴趣点。

四 寻找工作的日子

东京的诱惑力无处不在。

进入秋季之后，心情也随之渐渐变得开朗、快乐起来。这时，我和先生也试着换了种活法儿。我们抓紧时间四处踏寻、观赏、游玩，奔波陶醉在东京这个国际化的都市中。

现在的家实质上就是我们两个人。我们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。虽然孩子们尚未成家，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，但我们如今已经很难轻易地再聚到一起了，这就是现实的日本。我们变成了独立的两代人，各忙各的，各自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日程。

在中国时看日本的电视剧，总觉得怪怪的，不可思议，一家人在一起吃顿团圆饭都千载难逢的样子。那时，我还想日本的电视剧太夸张了，身